

《小说月报》 (1910 — 1931)
与中国文学的现代进程

..... 潘正文 著



NLIC2970966410



人民出版社

《小说月报》 (1910—1931)

与中国文学的现代进程

潘正文 著



NLIC2970955410



人民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夏 青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小说月报》(1910—1931)与中国文学的现代进程/潘正文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1

ISBN 978-7-01-012587-9

I. ①小… II. ①潘… III. ①中国文学-现代文学-文学研究②报刊-新闻事业史-中国-1910~1931 IV. ①I206.6②G219.2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23778 号

《小说月报》(1910—1931)与中国文学的现代进程

XIAOSHUO YUEBAO 1910—1931 YU ZHONGGUO WENXUE DE XIANDAI JINCHENG

潘正文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龙之冉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9.5

字数:350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978-7-01-012587-9 定价:45.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目 录

绪 言 /1

第一章 前后期《小说月报》的发展概况及其所体现的中国文学的 新旧过渡和演变 /4

第一节 《小说月报》的创刊背景及其办刊定位 /6

第二节 前期《小说月报》的编辑及办刊特色

——“旧”中的新 /15

第三节 沈雁冰改革《小说月报》与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 /28

第四节 郑振铎、叶圣陶编辑时期的《小说月报》

——世界文学视野与中国文学现代性最后

之完成 /40

第二章 《小说月报》与中国翻译文学的现代演进 /53

第一节 前、后期《小说月报》的翻译取向与文学观的演化 /55

第二节 前、后期《小说月报》的翻译文学与价值观的演变 /66

第三节 前、后期《小说月报》的翻译文体的现代演进 /77

第三章 《小说月报》与文学理论、批评的现代演进 /98

第一节 从“以中为法”的传统理论到“以西为法”的现代 理论 /100

第二节 从小说评点到现代作家论、作品论 /113

第三节 从“伴生/总结型”理论到“先导/现代性”理论
建构 / 130

第四章 《小说月报》的创作走向及其现代演变 / 148

第一节 《小说月报》小说创作题材与主题的现代演进 / 150

第二节 《小说月报》小说中的价值观念与伦理观念的现代演进 / 160

第三节 《小说月报》小说创作中叙述模式的现代演进 / 173

第四节 《小说月报》诗歌、散文、戏剧创作的现代演进 / 187

第五章 从“科学”到“人学”

——《小说月报》与中国文学现代性核心观的演进 / 215

第一节 作为现代性中心的“科学”观与科学小说

——《小说月报》科学小说翻译和创作中的
“科学” / 216

第二节 “科学小说”所体现的“科学”观的“异化” / 227

第三节 人道主义作为一种现代性理论在《小说月报》中的
展现

——以后期《小说月报》翻译中的泰戈尔“热”
为中心 / 238

第四节 后期《小说月报》小说创作中的“现代性”伦理
演变 / 250

结 语 / 262

参考文献 / 275

人名索引 / 299

后 记 / 304

绪 言

《小说月报》(1910—1931)是跨越中国近、现代,持续时间最久(22年),发行范围最广,影响最大的大型纯文学刊物之一,是中国文学近现代转型最重要的见证者和推动者。阿英在《晚清文艺报刊述略》中对《小说月报》这样评价道:“这是在民国初年和五四运动以后影响很大的文学刊物。”^①

在中国文学由古典向现代的转型中,文学期刊因为发行范围广,持续时间长,团结有一批文人群体,影响于一时的风气,因此对于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促进作用具有无可替代的地位。《小说月报》虽然不比《新小说》的开一代风气,但它是国内影响最大的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创办的坚持时间最长的纯文学刊物,它以务实的作风和长久地坚持,在中国文学的现代进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它几乎是见证了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相对完整的过程,在这一点上,很难有其他的文学期刊可与《小说月报》比肩。正因为如此,所以,《小说月报》越来越受到研究界的重视。

到目前为止,已经出版的直接以《小说月报》为题的研究专著已经有多部,计有:柳珊的《在历史缝隙间挣扎——1910—1920年间的〈小说月报〉研究》,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谢晓霞的《〈小说月报〉1910—1920:商业、文化与未完成的现代性》,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董丽敏的《想像现代性——革新时期的〈小说月报〉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直接以《小说月报》为题的博士论文,计有:谢菊的《转折时期的中国文学:1921—1931年间的〈小说月报〉研究》,复旦大学2002年;邱培成的《前期〈小说月报〉与清末民初上海都市文化》,复旦大学2004年;吴燕的《翻译

^① 阿英:《晚清文艺报刊述略》,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41页。

相异性:1910—1920年《小说月报》对“异域”的表述》,暨南大学2006年;高志强的《〈小说月报〉(1921—1931)翻译文学初探》,北京语言大学2007年;傅惠生的《〈小说月报〉(1921—1931)翻译小说的现代性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09年。已经发表的直接以《小说月报》为题的学术论文,有一百多篇,其中以殷克勤、柳珊、谢晓霞、董丽敏、杨庆东发表的相关论文数量较多。就此而言,有关《小说月报》的研究不可谓不充分,这为我们的后续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但统观现有的研究专著和论文可以看到,在目前的学术体制和研究框架中,研究者普遍将前期《小说月报》(1910—1920)和后期《小说月报》(1921—1931)分开来研究,它们被分置于不同的学科体系和研究系统之中:前期《小说月报》被置于古代文学和近代文学的研究范围,而后期《小说月报》则被置于现代文学研究的范围;前期《小说月报》被放置于通俗文学研究系统中,而后期《小说月报》则被放置在纯文学研究系统中。应该说,有关《小说月报》研究前、后期分置的做法,不仅与《小说月报》前后期的办刊情况有关,也与现有的学科体制有关,但从中国文学由传统向现代的演变和转型角度看,现有研究前、后分开的做法,无疑无法完整地呈现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全过程。

其实,不少研究者已经注意到,中国文学研究不能以五四为分界截然地划分为两段,范伯群先生就曾反复指出,晚清到五四以前的通俗文学,是中国文学现代转型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如果砍断这个链条,就无法完整地考察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全过程。王德威也曾指出:“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具体到《小说月报》的研究上,殷克勤的《简论〈小说月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是较早地将前后期《小说月报》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它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的研究论文,从该刊创刊、发行情况、办刊宗旨、办刊人员构成及更替、刊物各时期特色、刊物内容及特点、主要作家的创作情况等方面,论述其沿革变迁情况,并论证其在中国现代文学发生期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与影响。^①这是相当难能可贵的。可惜的是殷

① 参见殷克勤:《简论〈小说月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之一)》,《扬州师範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3期。该文分4号连载于《扬州师範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3、4期,1994年第3、4期。

克勤的研究限于论文,篇幅有限,只能对前后期《小说月报》做一个整体性的介绍,很多重要的问题都无法展开和深入。董丽敏的《想像现代性——革新时期的〈小说月报〉研究》,将研究重点放在了《小说月报》改革前后的延续和变化之上,它力图通过改革前后的《小说月报》来还原中国文学现代转型过程中的前后延续和变化,而不是将前、后期《小说月报》视为断裂的两个整体,这相当准确地抓住了中国文学现代转型中的关键环节。不过,这部专著主要集中于考察《小说月报》改革前后的两三年间,这为对前、后期做通盘考察的更为整体性的研究留下了较大的空间。

《小说月报》前、后期的变化,相当真实地反映了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过程,那就是,由近代文学的中西混合,通俗文学一度扮演主角,到现代文学的以西为法,纯文学走向学科化。这是一个完整的流程,相当全面地呈现了中国文学现代转型过程中的复杂性。前期《小说月报》虽然受到过新文学人士的攻击,被指为有“鸳鸯蝴蝶派”的嫌疑,但是,这并不代表它在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过程中扮演的只是一个反面角色,如果我们把“以西为法”的新文学比喻成是天鹅的话,那么,前期《小说月报》所代表的中西杂糅的文学和通俗文学,就是中国文学现代转型过程中的丑小鸭阶段。

笔者认为,将前后期《小说月报》作为一个完整的整体来研究,对于考察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完整过程来说,也许要比现有的将前、后期分开来研究更有意义。将前、后期《小说月报》结合起来做连续性的研究,可以比较全面地考察中国近、现代文学转型中的演变和发展规律,对于探讨中国近、现代文学转型过程中的创作、翻译观念的演变,作品题材、主题、叙事与抒情方式、审美取向等各个方面的现代进展及与文学理论与批评的现代演进,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

第一章 前后期《小说月报》的发展概况 及其所体现的中国文学的新旧 过渡和演变

有关《小说月报》的概况,殷克勤先生做了很好的统计工作,为我们提供了不少便利。《小说月报》是商务印书馆主办的大型文学期刊,自1910年8月创刊,到1931年12月出至第22卷第12号终刊,共出刊22卷259期(含增刊1期)、又号外3册,前后历时22年,是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最为长寿的文学刊物,^①贯穿了中国文学由维新运动以来的半新半旧状态到五四新文学革命后的现代转型之完成的全过程。前4卷为25开本,自5卷1号起放大版本为16开,同时扩大篇幅,每期字数由6万增至10万,较原有增加2/5。12卷以后的《小说月报》每期字数约在10万—12万字之间,多时达23万字,号外《中国文学研究》甚至超过60万字。全部《小说月报》总字数达两千七百余万,容量之大,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绝无仅有。《小说月报》每年1卷,每月出1号,先后采用过宣统、辛亥、民国三种年号。《小说月报》第一、第二年出版日为阴历每月二十五日,卷号从阴历年。从第三年第1号开始,出版日改公历每月25日。前5卷的卷、期号受历法不一的影响,不与公历年月对应。1914年12月,《小说月报》采取一个月内出4号的非常措施,扭转这种状况。从6卷1号起,《小说月报》卷、期号与公历年、

^① 殷克勤较早就对此做过统计,参见殷克勤:《简论〈小说月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之一)》,《扬州师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3期。

月分别对应。从12卷1号起,出版日改为公历每月10日,直至终刊。^①

《小说月报》总发行所设在上海市棋盘街中市商务印书馆内,各地的商务印书馆分馆均有分售处。标明的分售处最多时达45处: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哈尔滨、长春、龙江、太原、济南、开封、洛阳、西安、成都、重庆、福州、厦门、广州、潮州、韶州、汕头、佛山、桂林、梧州、长沙、衡州、宝庆、常德、汉口、武昌、南昌、杭州、九江、袁州、安庆、蚌埠、芜湖、南京、兰州、吴兴、云南、贵阳、澳门、香港、新加坡。规模巨大的发行网不仅遍布全国,而且延及港澳地区,使《小说月报》具有全国乃至海外的影响,这是其他近现代文学刊物难以相比的。^②

1910—1920年间中国国内所发行的文学期刊,刊行时间几乎都是一两年的时间,只有极少数的,如《妇女时报》、《小说丛报》、《小说新报》、《小说大观》、《小说画报》、《世界画报》超过五年以上,没有一份刊物刊行时间超过十年的,唯有改革前的《小说月报》发行长达十年之久,独领风骚,持续时间为当时同类期刊之最。可见《小说月报》的影响力之大,品牌效应深远。这为后期《小说月报》的存续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小说月报》出版22年间,共经历了五位主编:王蕴章(1、2卷、9卷至11卷,其中第11卷为王蕴章与沈雁冰合编)、恽铁樵(3卷至8卷,按,2卷12号恽氏就已经接任,但当时稿子已经大体上由王蕴章组定,恽氏只在插画等外在形式上做了些改变)、沈雁冰(12、13卷,按,11卷1号起,开始编“小说新潮栏”,但其他部分由王蕴章负责)、郑振铎(14卷至18卷5号,20卷至22卷)、叶圣陶(18卷6号至19卷12号),外加一位助编徐调孚(15卷起)。

这22年的《小说月报》作为中国文学近现代转型过程中的中流砥柱式的刊物,其历任主编的聘任及其任内的办刊特色,既体现了其东家商务印书馆对于中国文学近现代演变的认可程度,也体现了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平均状态”,一旦遇到主编的发稿和办刊特色偏离“平均状态”较大时,就

① 参见殷克勤:《简论〈小说月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之一)》,《扬州师範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3期。

② 参见殷克勤:《简论〈小说月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之一)》,《扬州师範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3期。

会发生主编更换的现象——无论是自然的更换还是商务印书馆的主动更换。当然,前期的《小说月报》大体上还属于中国文学现代转型还未完成的过渡状态、半新半旧状态,它所代表的大体上是这种状态中的平均值;而1921年改革后隶属于新文学阵营的《小说月报》,虽然是新文学界最早的纯文学杂志,但它除了沈雁冰编的前面两年相对激进外,其他时候仍然走的是中游路线,与《创造》季刊、《创造》周报的狂飙突进相比,要稳健得多,大体上也代表着新文学领域的中间值状态。因此,从前、后期《小说月报》的发展演变历程中,可以大致看出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均值状态,相对于过于激进、先锋或过于保守的刊物而言,《小说月报》对于中国文学发展进程的均值状态的代表性意义无疑是比较强的。

第一节 《小说月报》的创刊背景及其办刊定位

文学杂志的出现和流行,是一种现代性现象,它使得文学的流通方式得到了拓展,同时也具备了拓展舆论空间的功能。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文学杂志居功至伟。传统中国,不存在公众性的报刊,所谓的邸报,只在官府人员中通行,与大众无关。1815年8月5日,马礼逊在英国伦敦布道会派来的另一个传教士米怜(William Milne)的协助下,在马六甲出版了一份期刊《察世俗每月统纪传》,中国人梁发参与编辑,免费在南洋华侨中散发,其中一部分由专人带到广州赠送,开了中国公共报刊的先河。其后在中国国内有不少传教士办的中文报刊出现,为了加强报刊的流通,文学作品开始附入报刊之中。特别是鸦片战争后,随着商业化报刊的出现,为了增加报刊的销售量,办报人开始有意识地在报刊上网罗一些文学作品。1872年,第一份中文的文学杂志《瀛寰琐记》在上海创刊,由上海申报馆刊行,随《申报》附送。1892年,韩邦庆在上海创办了中国第一份小说期刊《海上奇书》,由《申报》馆代售,这份小说杂志的创刊,纯粹出于商业的目的并形成了小说期刊与商业联姻的传统和惯例。商业化文学杂志的出现,为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提供了传播方面的条件。但是,纯商业化的文学杂志,也有其不足之处,那就是,文学作为商品,在中国传统的土壤里,不易受到精英知识分

子的重视。

甲午中日战争中国战败后,维新派人士出于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的需要,开始重视小说,严复、夏曾佑于1897年在《国闻报》上附印小说,提出:“欧、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①他们对小说的重视,主要不是出于商业性目的,而是以小说为社会改革之助。同年,康有为也在《〈日本书目志〉识语》中提出:“今中国识字人寡……经义史故,亟宜译小说而讲通之。泰西尤隆小说学哉。”^②同年,梁启超在《变法通议·论幼学》中谈到“说部”时也提出:“今宜专用俚语,广著群书:上之可以借阐圣教,下之可以杂述史事,近之可以激发国耻,远之可以旁及彝情,乃至宦途丑态,试场恶趣,鸦片顽癖,缠足虐刑,皆可穷极异形,振厉末俗,其为补益岂有量耶!”^③出于政治改革的目的,梁启超在《清议报》上提倡广译“政治小说”,并言之凿凿地说:“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④这是否是世界各国的实际情况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维新派把小说与国家的政治和社会改革联系在一起,无疑大大提升了在中国传统文学领域内本属于“小道”的小说的地位,使得小说受到了格外的重视。维新运动失败后,梁启超等人在意识到走上层改革路线不通的情况下,认为唯有启蒙知识分子和下层民众,才是中国实行社会改革的希望。这促使维新派更加重视受众范围很广的文体——小说,为此,1902年梁启超创办了《新小说》,着眼于通过小说来“新民”:“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⑤小说,成了包治中国百病的良药,由“小道”成为了“大道”。梁启超的这种“横议”,虽然非常不文学,但是,它对于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促动,却要远

① 几道、别士:《本馆附印说部缘起》,《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7页。

② 康有为:《〈日本书目志〉识语》,《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9页。

③ 梁启超:《变法通议·论幼学》,《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8页。

④ 任公(梁启超):《译印政治小说序》,《清议报》第1册,1898年。

⑤ 饮冰:《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新小说》第1号,1902年。

远大过任何一种纯文学的话语。因为,第一,要新小说,就不能不多译外国小说,要不然,中国小说在传统的轨道上滑行,就不可能“新”得了,而多译外国小说,则为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提供了重要条件,中国新文学说到底,就是以西为法的文学。第二,这为知识分子业余投身于小说的翻译和创作,找到了一个很冠冕、很重大的理由,使得中国知识分子不会像传统那样以身份为由不屑于小说的创作,知识分子业余写写小说,业余翻译翻译小说,就不再是玩票了,不再是不务正业了,而是关系国家兴亡的大计。第三,它为职业化的小说翻译家和小说作家提供了一个高尚其身份的说辞,靠小说创作卖文为生,就不用再担心被骂为“文丐”了,因为小说成为了改革社会人心、事关中国存亡的大事,职业写小说或译小说,不再是为了一己的生活,而是在为中国的现代化服务。因此,自《新小说》创办后不久,就出现了《新小说》(1902—1906)、《绣像小说》(1903—1906)、《月月小说》(1906—1909)、《小说林》(1907—1908)并称“晚清四大小说期刊”的繁荣局面,其后,小说杂志在中国如雨后春笋般地冒出。

大致以《新小说》的创刊为标志,中国文坛进入了中西杂糅、新旧杂糅的时代。所谓新,一方面是大量翻译小说的出现;另一方面是中国本土的小说创作在观念、文体、题材、门类、主题、价值观、叙事模式上,增加了大量的外来因素。所谓旧,是中国本土的小说创作,一时并没有像五四后那样全盘西化,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还在传统的轨道上惯性滑行。《新小说》将小说分为历史小说、政治小说、哲理科学小说、军事小说、冒险小说、侦探小说、写情小说、语怪小说、割记体小说(按,如《聊斋》一类)、传奇体小说、世界名人逸事(体例略如《世说新语》)^①。从这份栏目名单就可以看出中西杂糅、新旧杂糅的现象。中国传统小说门类之所以没有被梁启超抛弃,一方面固然与他的视野局限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他考虑到小说必须适应中国读者的审美习惯有关。初期的改革者,是不可能完全抛弃传统的,一旦完全抛弃传统,其改革也就会无法实行。《新小说》所分的这些小说门类,有很多为《绣像小说》、《月月小说》、《小说林》等小说期刊所继承。《新小说》重视小说的社会改造功能的做法,也受到了清末民初中国文坛的纷

^① 参见新小说报社:《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新民丛报》第14号,1902年。

纷效法。但是,小说期刊的生存基础是商业化,它必须有一定的销量才能长期生存,而像《新小说》那样过于重视政治宣讲和说教,势必影响刊物的可读性,从而影响发行销售,因此,侦探小说、言情小说、冒险小说等故事性强、可读性强的种类,就在市场化的运作中脱颖而出,成为了清末民初中国小说的重要门类,大量流行,而政治小说等可读性差的门类,就逐渐淡出。市场化的结果,最终导致通俗类小说逐渐占据民初中国文坛的中心。

从1910年《小说时报》创刊以后,中国的文学期刊开始出现了一种新局面,那就是启蒙性、文化性逐渐退居其次,以迎合市民需要的休闲性、娱乐性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至此,1910—1920年出现了近代文学期刊史上第二次办刊高峰,大量的文学期刊开始涌现,《小说月报》就是在这一背景之下创刊的。当时文坛的这种文学生态,不能不对《小说月报》的办刊和发展产生种种影响。但是,《小说月报》又是一份相对特殊的刊物,这与它的创办机构——商务印书馆有很大的关系。

《小说月报》是商务印书馆创办的刊物,在《小说月报》之前,商务印书馆于1903年创办了《绣像小说》,由李伯元主编。李伯元不仅是晚清著名的小说作家,创作有《庚子国变弹词》、《官场现形记》、《文明小史》、《中国现在记》、《活地狱》、《海天鸿雪记》以及《李莲英》、《海上繁华梦》、《南亭笔记》、《南亭四话》、《滑稽丛话》、《尘海妙品》、《奇书快睹》、《醒世缘弹词》等十多种,以谴责小说闻名于世;而且,他还是著名的编辑,有丰富的编辑经验,创办过《指南报》、《游戏报》、《世界繁华报》。他在批判社会、谴责黑暗以促进社会改革和文学的商业化运作之间,做到了较好的融合,深通这一方面的门径。这恐怕也是商务印书馆选中他来主编《绣像小说》的重要原因。《绣像小说》在办刊宗旨和体制上,一方面,学习了《新小说》的做法,重视引进西方文学,重视小说的社会改造功能;另一方面,它又比《新小说》更重视可读性,更重视面对市场。应该说,在读者面上,在销售上,在流通之广上,《绣像小说》超过了过于注重说教的《新小说》,艺术色彩也要比《新小说》浓厚。从文学期刊本身的角度看,《绣像小说》是较为成功的,但由于李伯元于1906年去世,《绣像小说》因此停刊。1910年创刊的《小说月报》,是作为《绣像小说》的后续替代性刊物出现的。《小说月报》创刊号上的“编辑大意”很明确:“本馆旧有《绣像小说》之刊,欢迎一时,嗣响遽寂,用广前例,辑

成是报。”^①

作为商务印书馆所办的纯文学期刊,《小说月报》无论是在风格上,还是在编辑路线上,都受到商务印书馆的无形制约,虽然商务印书馆的惯例是不干涉主编的编辑方针,但是,这不等于《小说月报》就不用受商务印书馆的控制,可以随心所欲。商务印书馆创办于1897年,创办人为夏瑞芳、鲍咸恩、鲍咸昌、高凤池等。初为合伙经营的小型印刷工厂。1901年,改为股份有限公司,资本增至5万元,张元济入股并主持编译工作。1903年,建立印刷所、编译所和发行所,改为中日合办,资本各10万元,引进日本先进印刷技术。翌年,编印《最新国文教科书》,数月间风行全国。此后,陆续编印修身、算术、史地、英语等教科书,兴办师范讲习班、附属小学、养正幼稚园及函授学校,还出版各种中外文工具书、刊物和学术著作。1907年,在上海闸北宝山路建成印刷总厂和编译所新址。1909年,将编译所收藏古籍善本和参考书籍的图书馆定名为涵芬楼,后改名为东方图书馆,对外开放。1914年年初清退日股,资本增至150万元,职工达750人,成为国内最大的集编辑、印刷、发行为一体的出版企业。商务印书馆作为商业出版机构,当然重视文学刊物的商业利益,这决定了《小说月报》必然是一份商业性的文学刊物,可读性,是它存在的前提。但是,作为一家发迹于教科书的出版机构,它又不能没有社会责任感而唯利是图,这就决定了《小说月报》必然是一份相对严谨的文学刊物,重视社会责任,重视文化上的推广和进步,也就成为了它必须承担的职责。更为重要的是,商务印书馆的掌舵人张元济不仅是一位精明的商人,而且还是维新人士,出版大家,这无形之中会对《小说月报》的办刊方向起到种种影响。

张元济(1867—1959),号菊生,浙江海盐人。出生于名门望族,书香世家,清末中进士,入翰林院任庶吉士,后在总理事务衙门任章京,曾参与维新。戊戌变法时光绪帝曾破格召见,政变后被革职,由政治转入教育、出版。1896年,和陈昭常等人创办教授西学的通艺学堂。1898年冬,任南洋公学(交通大学)管理译书院事务兼总校,注意译书的选题意义,改变原著重译兵书为译社科书籍。1901年,他以“开启民智”、“辅助教育”为目的,投资

^① 《编辑大意》,《小说月报》1卷1号,1910年。

商务印书馆并主持该馆编译工作。1903 年任该馆编译所所长,1916 年任经理,1920—1926 年改任监理。1926 年任董事长直至逝世。他主持商务印书馆期间,组织了大规模的编译所并创办了涵芬楼,在编译所内容纳了大量的国外留学回来的硕士、博士,以至于后来有“北有北大,南有商务”的说法。《绣像小说》、《小说月报》皆为张元济任商务编译所所长期间创办。从《绣像小说》创办于 1903 年 5 月——正处在《新小说》1903 年 1 月至 6 月停刊期间(《新小说》1903 年 1 月出完第 3 期,直到 1903 年 6 月才出第 4 期,这对于作为月刊的《新小说》来说,无异于是停刊了 5 个月),就可以看出张元济的商业敏感,他无疑是抓了个空档,但与此同时,这也可以看出张元济对于梁启超的《新小说》的办刊宗旨和办刊方向上的认同。从《绣像小说》的发刊词上,也能看出这一点:“欧美化民,多由小说起;樽桑崛起,推波助澜。其从事于此者,率皆名公巨卿,魁儒硕彦,察天下之大势,洞人类之颐里,潜推万古,豫揣将来,然后抒一己之见,著而为书,以醒齐民之耳目,或对人群之积弊而下砭,或为国家之危险而立鉴,揆其立意,无一非裨国利民……本馆有鉴于此,于是纠合同志,首辑此编。远摭泰西之良规,近挹海东之余韵,或手著,或译本,随时甄录。”^①这番说辞,与梁启超的观点大同小异,都认为小说是大道,是中国学习西方化民之法的重要手段,可以推动社会变革,并且主张译和著并重。当然,视小说为大道,并不代表《绣像小说》就不重视刊物的商业性,可读性也是它一直孜孜以求的目标。

《小说月报》创刊于 1910 年 8 月 29 日,基本上秉承了《绣像小说》的办刊宗旨和办刊方向。那就是,一方面,注重刊物的可读性,必须保证商业利益;另一方面,也重视刊物的社会责任,重视小说对于启蒙大众、改良社会的功能。新旧杂糅,译著各半。总之,走折中路线,是《小说月报》的重要特点。在创刊号的“编辑大意”上,《小说月报》称:“本报以译译名作,缀述旧闻,灌输新理,增进常识为宗旨。”^②这里,既提出了译名作(新),也提出述旧闻(旧),同时,重视开民智(新理,常识)。另外,它也强调可读性,声称自己刊发的小说“材料丰富,趣味浓深”^③。在体裁的要求上,也能看出《小说

① 商务印书馆主人:《本馆编印〈绣像小说〉缘起》,《绣像小说》第 1 期,1903 年。

② 《编辑大意》,《小说月报》1 卷 1 号,1910 年。

③ 《编辑大意》,《小说月报》1 卷 1 号,1910 年。

月报》的半新半旧色彩：“其体裁则长篇、短篇、文言、白话……无美不收，其内容则侦探、言情、政治、历史、科学、社会各种皆备。”^①另一方面，“编辑大意”还体现了这份刊物在办刊上的严谨性：“本报券首插图数页，选择甚严，不尚俗艳，专取名人书画以及风景古迹足以唤起特别之观念者。”^②这虽然是在说刊物的插图，但也映射出它不过分俯就流俗，在商业性外有志于改革社会风气和不良审美习惯的一面。当然，在日后的执行过程中，《小说月报》曾一度在插图上并不那么严格，如从第二年开始，也刊登过妓女的照片，如第2卷第4号的插图是“北京名妓扑朔迷离图”，为四位名妓的合影。这可以看做是《小说月报》向流行风气妥协、向商业性妥协的一面。但总体而言，插图用妓女照片的时间并不太长，总体上还是以名人书画及风景古迹为主，有时也用国外著名作家的肖像。

可以说，《新小说》以来的文学期刊办刊方向，与1910年至1920年这一时间段中国文坛的商业化、娱乐化、通俗化倾向以及商务印书馆这个大型的商业出版机构，共同决定了《小说月报》的办刊方向和办刊特色，这就是：第一，走中西杂糅、新旧杂糅的道路。不新、不西，它作为小说期刊存在的意义就要大打折扣，纯商业化的文学，必然被知识分子所看低；而不中、不旧，又会因为无法适合中国读者的审美习惯而丧失市场，导致杂志无法生存。这是前期《小说月报》的重要特点。第二，兼顾文学的启蒙与商业利益。过于认同流俗，必然没有文化品位，这是商务印书馆这样大型的出版机构所不愿意看到的，而过于强调文化性，又会导致杂志的可读性差，这也是必须考虑商业利益的商务印书馆所不允许的。因此，《小说月报》必须走兼顾文化与文学的启蒙与商业利益的道路，既注重刊物的文化启蒙意义，又注重作品的通俗性、可读性。这一点，是前、后期《小说月报》共通的特点。

前、后期《小说月报》虽然被后世文学史家划分为旧、新两大不同的文学阵营，但从办刊定位来看，前、后期的连续性还是非常明显的。

其一，注重刊物的启蒙性和开民智的作用。这主要体现为：首先，无论是前期还是后期，翻译都在《小说月报》上占有重要地位，创作与翻译几乎

① 《编辑大意》，《小说月报》1卷1号，1910年。

② 《编辑大意》，《小说月报》1卷1号，1910年。